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仪式与传说：宁波它山 庙会的文化传播研究

Yishi Yu Chuanshuo: Ningbo Tuoshan
Miaohui De Wenhua Chuanbo Yanjiu

肖荣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仪式与传说：宁波它山 庙会的文化传播研究

Yishi Yu Chuanshuo: Ningbo Tuoshan
Miaohui De Wenhua Chuanbo Yanjiu

肖荣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式与传说：宁波它山庙会的文化传播研究 / 肖荣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 7 - 5161 - 9073 - 9

I. ①仪… II. ①肖… III. ①庙会 - 文化传播 - 研究 - 宁波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173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一 庙会研究	(3)
二 文化传播视域下的仪式与传说研究	(8)
第三节 研究意义、思路及创新点	(18)
一 研究意义	(18)
二 思路	(21)
三 创新点	(2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3)
一 文献分析法	(24)
二 参与观察法	(24)
三 访谈法	(25)
四 “过程—事件分析”法	(26)
第五节 调查点、调查范围与调查进程	(28)
一 调查点的选择	(28)
二 调查范围的界定	(29)
三 调查进程	(30)
第一章 庙会文化传播的背景	(32)
第一节 走进田野	(32)
一 自然地理	(32)
二 经济概况	(36)
三 行政沿革	(37)
四 村落与人口	(39)

第二节 它山庙会文化的历史谱系	(40)
一 当地民间文化概述	(40)
二 它山庙会的渊源及本质	(43)
三 庙宇分布	(46)
第三节 它山庙会的历史变迁及核心要素	(48)
一 它山庙会的演变	(48)
二 作为“第三领域”的它山庙会	(52)
三 它山庙会文化传播的核心：仪式与传说	(53)
本章小结	(56)
第二章 庙会的仪式传播	(57)
第一节 庙会仪式的界定与深描	(58)
一 庙会仪式的界定	(58)
二 历史上的它山庙会仪式	(60)
三 当前的它山庙会仪式	(64)
第二节 庙会仪式传播的语言符号	(75)
一 作为传播活动的庙会仪式	(75)
二 庙会仪式上的祭文	(77)
第三节 庙会仪式传播的非语言符号	(81)
一 庙会仪式上的祭品	(82)
二 庙会仪式上的道具	(87)
三 庙会仪式上的服饰	(89)
本章小结	(91)
第三章 庙会传说的传播	(93)
第一节 庙会传说的界定与内容	(94)
一 庙会传说的界定	(94)
二 它山庙会传说的主体内容	(96)
三 它山庙会传说的传播情境	(100)
第二节 庙会传说的传播内容分析	(102)
一 “仁”性的光辉	(103)
二 “义”不容辞的情	(105)
三 念念不忘的“孝”	(106)
第三节 庙会传说的传播形式与特征	(108)

一 以口头传播为主要形式	(109)
二 以人际传播为主要渠道	(111)
三 传说与仪式紧密相连	(113)
四 传说传播的集群性特征	(114)
第四节 传说传播的社会功能	(115)
一 传承集体记忆	(115)
二 促进地方社会整合	(117)
三 教育与娱乐的功能	(119)
本章小结	(120)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中的庙会文化传播	(122)
第一节 庙会文化与村落日常生活	(123)
一 庙会文化与村落生活的节律	(123)
二 普堂：约定俗成的生命转折仪式	(127)
第二节 庙会文化的家园观念与社会动员	(129)
一 日常生活中的祭拜仪式	(129)
二 修桥：庙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动员	(131)
第三节 庙会生活中的交换与人际关系的维系	(137)
一 庙会生活中的交换	(137)
二 陪饭：情感的礼物	(139)
本章小结	(144)
第五章 庙会文化传播的政治经济体系	(146)
第一节 庙会的组织与资金的来源	(147)
一 庙宇的供养与管理	(147)
二 庙会的正式组织与民间自组织	(148)
三 庙会资金的来源及构成	(150)
第二节 庙会文化的控制与再生产	(154)
一 政府在场：它山庙会文化的开发与传播	(154)
二 庙会文化的再生产	(157)
第三节 庙会文化传播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61)
一 统合主义视角下的庙会运作	(161)
二 传统时期庙会文化传播的“界下制度”	(163)
三 当前庙会文化传播的统合主义制度	(165)

本章小结	(168)
第六章 庙会文化传播的逻辑与社会意义	(170)
第一节 庙会文化传播的面子	(172)
一 中国社会的“关系”理解与研究	(172)
二 仪式庆典与面子	(176)
三 传说中的夸耀	(179)
第二节 庙会文化传播中的情感、伦理与权力	(180)
一 人与人的相逢	(180)
二 人与祖先、神明的相遇	(183)
三 关系与权力的融合	(185)
第三节 庙会文化传播的社会意义	(190)
一 促进文化与地域认同	(190)
二 塑造共同体	(192)
三 维护秩序的稳定	(194)
本章小结	(196)
结论与展望	(198)
一 它山庙会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变迁	(198)
二 庙会文化传播的机制、观念与逻辑	(203)
三 从庙会文化传播看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传播学的 本土化	(205)
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26)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有 5000 年的文明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虽是文化大国，但还远不是文化强国，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仍有待于发扬光大。学者甘阳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①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有关文明、文化、民族与国家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最突出的问题。

庙会作为中国一种传统文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和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庙会在中国农村和部分城市，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仍然或明或暗发挥着影响和作用，俨然构成了学者黄宗智所言的“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②。在笔者关注的它山庙会的运作中，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既合作，又警惕；既渗透，又剥离；既制度化，又非制度化。

一般认为，庙会起源于古老的祭祀活动，后演变为祭神、娱乐和购物的活动^③。它蕴含了中国人的观念、思想与心态，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经验与生活世界，是理解中国文化脉络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文化强国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复兴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透过庙会文化的传播过程，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正如社会学家曹

① 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载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2 页。

②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8—270 页。

③ 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2 页。

锦清先生所言，“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的历史，要把现实经验放到历史的流程里面去加以理解”。^①

确实如此，要想更好地研究中国，需要把中国的历史与实践纳入考察范围。西方的理论可以参考，但要避免生硬地嫁接。结合文化与传播的相关研究，正如学者赵月枝所述，“需要把日益活跃的‘东—南’和‘南—南’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当作重要的研究议题。需要把研究的视线从沿海与都市转向内地与乡村，并从‘结构的历史’和‘技术的历史’回到‘人的历史’中，在动态的历史逻辑中将民众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经验、传播实践、社会想象和他们对霸权的反抗一同纳入分析的视野，以超越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原点的‘中心辐射式’全球传播研究框架和议题设置思维定式”。^②对此，笔者深表赞同。据此，在重新审视“全球性知识”的基础上，研究“地方性知识”^③、在地表达与在地文化传播实践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历史学者陈春声针对当前人文学者的学术环境和取向曾提出这样一种呼吁，“小题大做”是一种好的学术态度体现，但“小题”背后要有大的问题意识。年青一代学人如何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这种解构的、碎片化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的意识与雄心，是年青一代学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问题。^④为此，笔者想通过对庙会文化传播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种努力与尝试。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社区的一项重要文化传播活动的细致关注，有利于我们把握全球化语境中区域文化传播的演变与运作机制，甚至能为我们观察和研究更为复杂而宏大的中国文化传播系统提供一定的参考。

①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3页。

② 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2010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暨第四届数位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12月。

③ 格尔茨（C. Geertz，有的地方翻译为吉尔兹，本书一律译为格尔茨）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ize），强调文化关联性与背景性，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主张从笼统的宏观（Global）回归到“地方性”（Local）的立场，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一种方法论。引自〔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5页。

④ 陈春声：《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第52页。

正是基于以上学术旨趣,本书期望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对庙会文化脉络及其传播网络进行分析与研究,就是说把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结合起来,在还原一个“整体性”庙会文化网络的基础上,深入民众的生活世界,关注传播过程中民众对庙会文化的理解与创造,避免高度抽象的宏大叙事,超越惯常的“国家与地方”“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等简单的二元逻辑,集中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文化主体的特定个体和群体的传播实践,及其作为中国社会不同构成要素的生活方式和关系,在具体的人文关怀中寻求理论的归宿。

当前,本书所讨论的庙会的所在地鄞江镇,正处于文化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当地的本土文化、集体记忆、历史传统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越来越多地被谈及。庙会、古镇、老桥以及传统的手工艺等,正在日益成为当地社会关注的文化焦点。走进鄞江镇,很容易观察到这一地区浓重的庙会文化气息:庙会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在当地社会空间流行甚广,并被民众视为本地重要的传统。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中,庙会文化被当地普遍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多种力量竞相参与到这一舞台之中。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样一个舞台中,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家与国、人与人、人与神等复杂多元的关系在隐秘地上演,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而滋生的文化传播实践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本书关注的它山庙会,历经1000多年仍经久不衰。在当地社会空间中,一方面全球化工业生产火热地进行,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另一方面,规模惊人的庙会活动仍然在当地民众的顶礼膜拜中进行,仪式、传说、进香、走书等活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笔者想追问的是,庙会作为一项在地重要的文化传播活动,是如何通过文化传播机制实现其社会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庙会研究

关于庙会的定义,1980年版的《辞海》是这样说的:“庙会,也称庙市,是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

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寺庙附近，故称庙会。”^① 这种说法得到庙会研究者的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关研究者开始突破陈说，从不同角度对庙会的内涵进行阐释，如段宝林、朱越利与小田等人对庙会的本质进行了阐述，然而表述取向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小田的阐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较适合当下庙会内涵的解释。不妨来看看小田所言：“庙会是以祠庙为依托，在特定时间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具有空间的结节性、主体的广泛性与内容的复合性等表现特点。”^②

（一）庙会研究学术史回顾

中国的庙会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晋周处《风土记》、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钱易《南部新书》、明清以来冯应京《月令广义》等。以上描述只是众多研究的冰山一角，类似文献，不胜枚举。但此类文献主要是简短、片断地记载庙会的相关场景，对庙会的整体过程缺乏陈述。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密不可分，至今长盛不衰，但长期未得到广泛而深入的研究^③。持类似观点的，主要有全汉升、丛治湘和赵世瑜等人。从文献信息中可以得知，中国古代虽对庙会有一些记载，对庙会现象有一些描述，但对某一特定时期庙会的确切数量和具体过程仍缺乏系统研究。

顾颉刚等人于 1925 年对妙峰山香会做了实地调查，后形成《妙峰山》一书。该著作开启了近代庙会研究的先河，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对妙峰山香客的进香过程及心理、碧霞元君信仰和妙峰山香会组织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④ 同一时期，奉宽所著的《妙峰山琐记》也不容忽视。自顾颉刚之后，有很多关于北京妙峰山的专著问世^⑤，刘锡诚主编的论文集《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吴效群的《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王晓丽的博士学位论文《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香客村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52 页。

② 小田：《“庙会”界说》，《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③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87 页。

④ 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 年，第 1020—1066 页。

⑤ 高雅楠：《庙会研究文献述评》，《理论界》2012 年第 2 期，第 146 页。

落活动的研究》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后续研究。可以说，妙峰山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集中的。

关于庙会的研究也零星分布在不同学术著作中，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就有过精彩的阐述，“较大的地方群体的定期集会有每年一次的‘段’的‘刘皇会’和每10年一次的‘双阳会’，当我坐在人们中间，听着他们叙述村际‘出会’那些令人兴奋的往事时，我明白地觉察到他们对于目前处境的沮丧和失望心情，然而对往事的回忆是形成人们目前对现状的态度的重要因素，在人们心目中，停止这些活动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下降。”^①可见，庙会文化对民众心理的抚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性”，而中止庙会活动带来的民众心态变化则形塑了社会变革重要的环境因素。庙会的相关研究也受到国外学者关注，如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代表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曾对庙会做过相关阐述，“栾城县地区有‘朝山会’，是该地区最大的庙会（集市），于每年三月十五日在苍岩山下举行，这类集会往往跨越宗族和村界，对乡村政权内部结构产生影响。”^②杜赞奇的观察是敏锐的，庙会的具体运作所产生的权力关系，组成了当时中国基层社会重要的文化网络。

在历史上，庙会在寻求“合法性”地位过程中，长期与国家权力形成多种形式的互动与博弈。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庙会曾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加以禁止，庙会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传播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庙会具有经济再生能力和被认为是民间文化遗产，部分“复兴”的乡村庙会为获得其公开生存的合法性、合理性，修正了生存策略，“在解释上尽可能与官方话语一致，在仪式实践上仍我行我素”。^③随着庙会文化的复兴，关于庙会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展开

1. 庙会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者主要有赵世瑜、朱小田（又名小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4页。

^②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7页。

^③ 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7页。

田)、刘铁梁、岳永逸等人。这些研究者对庙会有过长期的关注与跟踪研究。赵世瑜教授认为,“庙会及娱神活动具有明显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反规范性的特征,庙会狂欢具有心理调节器、社会控制安全阀及维系社会组织、增进群体凝聚力的良性功能”。^①对此说法,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当下的民间庙会已丧失狂欢精神,首先表现在权力政治或明显或潜在地作用于民间记忆”。^②对庙会是否有狂欢精神,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应该说,且不论庙会是否具有狂欢精神,但庙会活动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有研究者对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对各自界限有所区分,因为它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祭祀对象,也通过各自的庙会整合和凝聚自己的社区,但城乡之间又绝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本质上有一致的文化,敬神和庙会就是共同存在的现象”。^③刘铁梁的相关研究则强调庙会的“公共性”,对庙会与公共秩序、庙会与村落公共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岳永逸则通过民俗志的研究,认为“庙会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互构”。^④总的来说,庙会与社会变迁研究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从历史的维度,或从现实维度进行了考察,呈现出一批成果,但中观研究仍相对缺乏。

2. 庙会与社会经济的研究

相关问题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如小田对近代江南庙会的经费来源,以及庙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庙会已成为江南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⑤小田在其后续的研究中还进一步指出,近代江南的基层社会对庙会有“消费偏好”,庙会的交易与消费行为贯穿于农家的经济生活,并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关联。^⑥庙会的商贸经济功能研究也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如梁方对武汉

①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183页。

② 刘晓春:《非狂欢的庙会》,《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第19页。

③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4页。

④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95页。

⑤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58页。

⑥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庙会进行了考察,认为“庙会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武汉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①也有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新时期的庙会与社会经济进行了研究,如赵新平对晋北的庙会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庙会的祭祀活动和商品贸易活动,促进和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而休闲娱乐活动又拉动经济发展”。^②应该说,相关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以论文为主、以个案和断代史研究为主,目前仍缺乏相对系统的庙会与社会经济的研究。

3. 庙会与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

由于庙会依托寺庙而设,蕴含了宗教的烙印,因此,庙会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一直是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方面。代表性研究有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前文曾提及,这里不再赘述。比较集中的研究还有,华北地区的范庄龙牌信仰研究,如赵旭东对龙牌信仰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强调“作为国家与地方中介者的民俗发现者把自己对于龙的历史知识发现与地方性的龙牌的发现之间勾连在一起”。^③岳永逸则对华北梨区的“家中过会”进行了民族志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民众信仰认知的神、鬼、人等经典范式以及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民众信仰研究,并指出了庙会不仅是非常态的狂欢,更是日常生活的延续。^④王新民的博士学位论文则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他以陕西岐山的田野调查为例,对寺庙与庙会的仪式行为与民间信仰进行了考察,指出“鬼神信仰是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减震器’,人神鬼之间的互动所投射的其实是当地人对现实秩序在主观世界里的重新安排,正是借助鬼神信仰以及相应的仪式行为之独特实践,当地民众营造了其独特的生活世界”。^⑤

庙会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如美国学者沃森以两座天后庙为例,考察了中国南方地区崇拜天后的现象,认为“国家不

① 梁方:《城镇庙会及其嬗变——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93页。

② 赵新平:《庙会与乡村经济发展——以晋北大白水村为例》,《晋阳学刊》2009年第3期。

③ 赵旭东:《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庙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④ 岳永逸:《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⑤ 王新民:《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研究——以陕西岐山的田野调查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第1—3页。

是依靠强制手段，而是采用更为巧妙的方式来控制百姓的宗教生活，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① 华裔美国学者杨庆堃先生则认为，“中国的庙会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把宗教信仰、经济事务和娱乐活动交织在一起，把个人带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范围，扩大了社会交往场合”。^② 应该说，庙会与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还是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但真正把这种民间信仰当作宗教来考察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国内的相关研究。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对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或潜在的影响，有的相关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范式来考量中国的经验，正如学者萨义德所言，“东方人往往透过西方眼里来看东方，东方是西方建构的东方，东方很容易受到西方时髦的、风行一时的理论思潮的影响”。^③ 有趣的是，在庙会相关研究上，中国本土的研究者更容易受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而国外研究者却更能从中国具体的语境中修正西方范式。事实上，构建东方研究范式一直是许多学者呼吁的问题。

二 文化传播视域下的仪式与传说研究

（一）文化传播研究

要把文化与传播结合起来研究，有必要先对文化研究的脉络与基本路径先作一番梳理。早在19世纪末，泰勒就对文化进行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④ 泰勒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文化存在的方式与意义。但是，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威廉斯也曾对文化进行过精彩的阐述，他认为“文化就是某一种生活方式的描写，是所有意义的形式，它不仅表达了艺术与学术，同样也表达了体制和普通行为上

① [美] 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1960—1960年）》，载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② [美]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91页。

③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④ [英]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特定的意义与价值”。^①威廉斯对于文化的描述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因素对意义生产的影响。

霍尔则是这样对文化进行描述，“文化与其说是一套东西，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和一套行为，首要关注的是社会与团体成员之间意义的生产与交换”。^②可见霍尔对文化的理解非常注重“意义的生产与构造”。鲍曼则把文化的意义分成三大类：作为概念的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并认为“文化既是失序的动力，也是秩序的工具；既是老化的因素，也是不朽的条件；它是创造性的温床，同时也是规范法则的框架”。^③鲍曼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的社会功能。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则认为，“文化是一种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犹如计划、处方、规则等，人明显地依赖于这种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④可见，格尔茨把文化看成人对行为控制的一种机制或系统。

对文化研究稍作梳理，不难发现，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有着长期的研究传统与争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评，英国文化研究对文化的“社会性”阐释，两大阵营有着长期的交锋。前者将精力集中于技术与文化，后者则聚焦于媒体文化与流行文化。虽然两者都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坚持将文化放入生产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去研究，但是晚近几十年出现了“失去的联合”。为此，道格拉斯·凯尔纳呼吁“发展多元视角，为理解文化提供广泛的方法，使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的文化研究的方法相互补充，从而在新的结构中将它们结合起来”。^⑤通过追溯文化研究的传统和对其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所指的文化，是指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它应当被看作一个表意的系统，是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文化研究的兴趣，并不在于探寻“文本”的那个“单一性”“本质

① Williams Ramond. *Culture*. Fontana, 1981, 13.

② 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周敏译，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第58页。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郑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206页。

④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⑤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失去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吴志峰等编译，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22—27页。

的”、被承诺的意义，而在于“文本”的社会意义，以及它如何被挪用，又如何被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之中。^①从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中可以看出，“权力”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这个概念可以说得到了威廉斯、霍尔、宾内特（Tony Bennett）等文化研究巨匠无休止的系统阐述。威廉斯在他的权力概念史中曾指出，要回到文化上来，就必须与文化的现行思维进行部分脱离。当文化研究者迷惑于是否还能用“权力关系的观点”再定义文化研究领域时，有的人投向了更加“经验主义”式的研究，或从理论的角度诠释权力。然而，人们在后续的研究中慢慢地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对权力问题的批判性分析”^②。总体而言，西方文化研究的想象根植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语境中。因此，在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路径时，要特别警惕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本质主义的偏向。

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同样是很复杂和宽泛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只要是社会成员分享并互相传递的知识、态度、习惯、行为模式及效果等都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研究”。^③因此，要将传播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梳理它们的交叉地域，同时又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视野，要避免对两者进行简单的区分。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指出，文化是传播的同义词，实际上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构、同质。传播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传播是文化的工具，传播是人类文化延续发展的基本形式，同时文化又为传播形塑“环境”^④。也有国内研究者把文化传播研究分为进化论与传播学派，认为“进化论强调独立发明在人类文化的进化上的作用，却有忽视文化接触和文化传播的不足，而传播学派则认为传播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却低估了民族自身具有独创能力的一面”。^⑤传播学者王怡红认为，传播与文化具有同一关

① [英] 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周敏译，《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第57页。

② [澳] 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

③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④ 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65—66页。

⑤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